

被“奸”名遮蔽的蔡京

·陈歆耕·

在元代脱脱等编撰的《宋史奸臣传》中，蔡确、章惇、蔡京、蔡卞、吕惠卿、曾布皆赫然在列。蔡京当然有“奸”的一面；蔡京也有不那么“奸”的一面，甚至某些地方堪称伟大，遗憾他的光亮，被一条脏污的“奸”名抹布覆盖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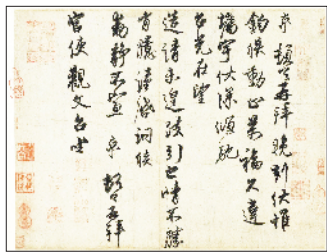
对王安石新法在承续基础上又有突破性创造者，当数蔡京。首先，蔡京在相位近二十年，有职权且花样翻新地推行“新政”，虽然中间几经波折；其次，蔡京干坏事、干好事都手段霹雳，有超强的执行力，是能干大事、干成大事的人。他的执行力，应该不亚于王安石。

大臣侯蒙曾在宋徽宗面前评价蔡京：“若心术正，当为千古贤相。”“心术”正歪，与为臣“贤”否，当然有关联。但在宋徽宗眼中，“心术”如何，只要不涉及忠诚，不威胁到其龙椅的稳定性，是无关紧要的。宋徽宗最需要的是“能”——治国理政的能力。称蔡京是千古“能臣”，是有史实作支撑的。

“崇宁兴学”

先说兴学，史称“崇宁兴学”。早在哲宗亲政，章惇即将任相时，蔡京就曾于道途中拜谒踌躇满志的拟任宰相，从衣袖中“出一轴以献（章）惇，如《学校法》、《安养院》之类”。但章大人心中不在此，拒绝了他的良谋：“元长可留他时自为之。”

到崇宁元年（1102），蔡京任相，立即于八月二十二日上疏建议天下兴学，获准。这份



蔡京《官使帖》（纸本行书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）

奏疏所奏的内容，可视作兴学的一份总体设计、规划：

以学校为今日先务，乞天下开置学养士，如允所请，乞先次施行。一乞罢开封府解额，除量留五十人充开封府上着人取应外，余并改充天下贡士之数……一乞置州学，并差教授二员。一乞增置田业养士，应本路常平户绝田土物业，契勘养士合用数拨充……

依蔡京“起请”，宋徽宗下达了一系列兴学的诏书。“崇宁新学”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无论兴学的范围、数量、体系，都超以往两次兴学，形成遍布全国州县的学校网络。据大观三年（1109）朝廷统计，全国24路教养大小学生总数达167622人，学舍有95298楹，各地学田计105990顷，形成“旷古未有”的规模。

令人惊叹的是，还同步设有六类专科学校：武学、律学、医学、算学、书学、画学，后三个门类为崇宁时期首创，中国美

术院校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。更为惊叹的是，对书学、画学考试，已经立出不同的等级标准。至大观元年（1107），原科举取士旧制废除，悉改由学校升贡。学生通过学校层层升级，最终经殿试进入政府授以官职。

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

再来看看宋徽宗、蔡京时期创设的对鳏寡贫病老弱者的社会救助机制。

在大雪飞扬的街头，一队巡视巷陌的小吏，看到一位拄拐佝偻乞的老人，立即向前，将之搀扶到一个专门的处所，交给那里的管理人员，这个处所名为“居养院”，相当于今日所称的福利院、养老院；当小吏们发现道侧已倒毙在寒风冰凌中的死者，则用麻布将尸体包裹，抬送到另一处所，这个处所名为“漏泽园”，相当于今日所称的公墓。还有一个处所名为“安济坊”，是官办的医疗诊所，专门收治那些贫病无钱诊治、无人护理的老者。

对这些，南宋的朱熹不吝赞词：“崇宁、大观之间，功成治定，惠泽洋溢，隆盛极矣。而上圣之心犹軫一夫之不获，始诏州县立安济坊、居养院以收恤疾病耆老之人，德至溥矣。”

崇宁五年（1106）八月，尚书省报告：有江南西路官员发

现某些漏泽园管理不善，导致有逝者“埋瘞不深，遂致暴露”，于是下诏“凡漏泽园收瘞遗骸，并深三尺”。管理精细到此种地步，不能不为之一叹！

理财·敛财

无论是君臣共享“丰亨豫大”，还是为民施仁政，都离不开一个东西：钱币。蔡京具有超强的理财能力，因而虽几番被罢，又几番被重新起用。

蔡京施行的经济变革是理财或敛财？抑或两者兼而有之？历来争论不休。诸如蔡京发行“当十钱”，即比当时的“当二钱”用料少、面额更大的钱币，遭遇的阻力最大。赵挺之、张商英取代蔡京任相，所做的第一件事即是废铸“当十钱”。“当十钱”只是在部分地区推行，确实为中央财政带来滚滚财源。但在今日看来，发行大额货币，几乎是全世界应对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之一。

蔡京的经济变革，还涉及茶法、盐法、漕运与方田法等。仅就茶法而言，有宋一代屡经变革，因其中有巨大市场空间和商业利润。政和二年（1112），蔡京对茶法进一步改革，形成了一整套政府与茶商共同购销茶叶的流通系统。首先由政府指定部门印行“茶引”，“茶引”是购销茶叶的合法凭证，商人必须首

先向政府部门购买“茶引”，才能据此去茶叶产地以低价向茶农批量购买茶叶，然后到指定的地点去提价销售。对茶商的购买量至销售情况，政府都全流程严密监控，并从中抽息，这就相当于现代政府的税收了。此种经营方式，也可称作“公私合营”。面对宋代庞大的茶叶消费市场，仅此一项就给政府带来多少财政收入？因此蔡京任相期间，宋徽宗的府库里是不缺钱的。面对堆积如山的钱币，皇上看到了蔡京理财（敛财）能力，也自然就滋生“有钱不享受更待何时”的念头。

也许会让人感到奇怪：既然蔡京有如此超强的理财（敛财）能力，为何未能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？反而在对外敌人入侵时居然不堪一击。既然蔡京有办居养院、安济坊、漏泽园的“仁者”之心，为何面对元祐党人，乃至同党的异己分子时却是那样冷酷无情、手段凶残？那个熟诵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幼童蔡京，与登上宰辅大位的蔡京，还是同一个蔡京吗？

也许有的问题很幼稚，有的问题很可笑，有的问题不是问题，那就权当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一笑了之。



（摘自《蔡京沉浮》，作家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）

《吴宓自编年谱》记载，他最早接触《红楼梦》，是在14岁的时候。“嗣父吴建常时自新疆赴母丧归，带回之行李中，有《增评补图石头记》一部，铅印本，十六册，吴宓见之大喜，立即阅读，并于夜间，伏衾中枕上，燃小煤油灯读之。每昼夜可读五回至六回……”从此，吴宓就与《红楼梦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一生追寻

在吴宓的日记中，读《红楼梦》的记录比比皆是。1915年9月14日，他在日记里写道：

中国写生之文，以《史记》为最工，小说则推《石头记》为巨擘。

他常常以《红楼梦》为参照，来思考文学与人生中的问题。1919年8月31日日记中，他在评论英国作家萨克雷作品时说：“他很多作品则酷似《红楼梦》，多叙王公贵人、名媛才子，又常用含蓄，褒贬寓于言外，深微婉挚，沉着高华，故上智之人独推尊之。”

吴宓西南联大的弟子在《有关吴宓教授两三事》中曾写道：吴宓告诉沈师光，当时他已经熟读了40遍《红楼梦》。沈师光此文中还记录了吴宓不跑警报的故事。有一次警报解除后，沈师光顺道去看看先生吴宓回来了没有，推门进去，沈师光大吃一惊。原来，吴宓正襟

吴宓的红楼情结

·樊树林·

危坐地正在读《红楼梦》。沈师光问他：“吴先生，您没跑警报吗？”他说：“没有。读《红楼梦》比跑警报有意思多了。”

吴宓对《红楼梦》的热爱持续了一生，他不但反复阅读，而且能熟背120回的回目。晚年时，吴宓的记忆力急剧衰退，有人进屋就睁开眼看，然后用手指轻轻叩击脑袋，嘴里自言自语：“这位先生是谁呢？”奇怪的是，即便如此，吴宓对《红楼梦》的回目背得一字不差。

传播红学

吴宓对红学的传播贡献是多方面的，是立体化呈现给公众的。他与其他红学专家最大的不同，就是不把自己封闭在书斋中，而是经常走近大众，与大家分享他对《红楼梦》的思考。

1919年3月初，还在哈佛留学的吴宓，就在哈佛大学作了一场关于《红楼梦》的演讲，次年，他把这次演讲的内容整理后，以“红楼梦新谈”为题，分两期发表在《民心周报》上。这是吴宓正式从事红学研究的开始。

吴宓来到西南联大后，继续推动并掀起了学校的《红楼

梦》热。1940年4月11日晚，陈铨在西南联大文林堂演讲《叔本华与红楼梦》，这次演讲由吴宓组织张罗。同年，研究《红楼梦》的“石社”成立，吴宓是“石社”重要成员。“石社”经常在晚间于南食堂举办活动，妙趣横生。汪曾祺回忆，吴宓讲《红楼梦研究》很受欢迎。经常有晚到的女生没有椅子坐，他就马上搬来椅子，等学生们坐好，他才开始讲课。吴宓的举动，也引起一些男生追随学习……

吴宓的红学善于把专业研究与大众传播始终结合在一起。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沈治钧的《吴宓红学讲座述略》统计，“自1919年仲春在波士顿首开记录，至1963年暮春在重庆悄然收尾，在44年间，吴宓开设了70多场业余性质的红学讲座。”

吴宓一生为情所困，经常自比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。顾毓琇等就有“千古多情吴雨僧”之句。有同事取笑吴宓是“情僧”，吴宓并不恼怒。有学生赠吴宓“妙玉”的绰号，他含笑答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。”陈寅恪也曾说吴宓是《红楼梦》中的妙玉，吴宓引为知己。



哈佛留学时期的吴宓

吴宓自称为紫鹃，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。吴宓曾发表过《论紫鹃》一文，文章中对紫鹃的忠诚、善良、执着的品格褒扬备至，文章尾句是：“欲知宓者，请视紫鹃。”联大新校舍对面有一家湖南人开的牛肉面馆，名曰“潇湘馆”。吴宓见后认为褻渎了林妹妹，勒令老板改名。双方争执不下，后有人出面调解，将“潇湘馆”改作“潇湘饭馆”才了事。

自成一派

红学真正开始走向成熟的时间，是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。彼时，胡适的考证派和蔡元培的索隐派，为广大社会公众所知。然而，吴宓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与这两派则大相径庭。

吴宓研究《红楼梦》，一开始就坚持文学批评的立场，而且比较有文学的视野。这从《红楼梦新谈》可以看出来。该文用哈佛大学曼格纳迪尔博士分析菲尔

丁长篇小说《汤姆·琼斯》时，所归纳的优秀小说应具备6个方面为理论依据，首次对《红楼梦》的艺术成就作了全面论述。

1967年2月1日，吴宓曾回顾道：“（哈佛演讲）用西洋小说法程（原理、技术）来衡量《红楼梦》，见得处处精上，结论是：《红楼梦》是一部伟大的小说，世界各国文学中未见其比。”因此，他在20世纪前半叶发表的一系列红学文章，都是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出发，坚持用文学批评的方法来写成的。

吴宓把《红楼梦》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究，更着重于对人物的剖析。吴宓写过很多文章，对贾宝玉、林黛玉、紫鹃、王熙凤等人物进行深入分析。不少红学研究者都对吴宓提出的一些观点表示欣赏。比如：吴宓最早注意到《红楼梦》有作者自写的成分，提出了“自况说”；在爱情观方面，吴宓强调精神之爱的重要性，认为“木石前盟”代表着爱情之理想，“金玉良缘”代表着现实的境界；吴宓从文学创作的规律和作品结构的完整性上分析，认为《红楼梦》后40回并非高鹗续书……

“一生文章矜四海，半生骚怨寄红楼。”这是吴宓挚友姚文青给他赠诗里的两句，对吴宓及其红楼情结概括十分到位。（摘自《文史精华》2023年第2期）